

《新华南》:华南抗战宣传线上的生力军

张红春

《新华南》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创办的党刊。其宗旨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引导广大青年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动员其他各阶层民众汇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神圣使命。《新华南》在国统区生存发展的环境异常艰难,处处受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钳制。但《新华南》仍旧发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处处体现党报党刊的战斗功能,成为党在华南地区宣传战线上的生力军,发挥了引领华南抗战舆论的重要作用。

一、痛斥奸谬:揭露日汪阴谋,批判投降主义

作为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新华南》题中应有之义。《新华南》创刊之际,正值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行为的高峰时期,为此,《新华南》给予了严厉批判与斥责。

一是出版反汪特辑,形成舆论攻势。以华制华,是敌人企图灭亡中国的重要策略的一部分。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翌年7月,汪精卫抵穗,鼓吹“广东局部和平”,散布投降卖国论调,企图配合日寇在华北华中新的军事政治行动。一些拥汪分子也四处活动,互相呼应,鼓吹对日妥协,公开做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对于汪精卫的阴谋,《新华南》早已有所警惕。该刊在1939年5月出版的一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汪逆觊觎华南》的短评,提醒人们予以密切关注。为了充分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将他窜粤的企图曝光,使人们对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加深了解,《新华南》在第一卷第七期发了“讨汪特辑”,发表了石辟澜的《三民主义乎?“三反主义乎”?》犀利指出汪伪“反共、反蒋、反战”的本质;李平之的《展开群众的讨汪

清奸运动》则提出“街头演讲、漫画宣传”等具体策略。任毕明的《提防冒牌劣货捉拿卖假药的棍徒》用方言俚语讽刺汉奸,被民众传抄张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在1940年6月1日复刊后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上登有思慕的《汪逆傀儡的登台及其新花样》、谭天度的《对汪逆伪组织的认识与反汪运动》、李筱峰 of《怎样展开群众的反汪工作》等文章。该期的编后记中说,“以反汪为中心内容的三篇文章都有互相关联性的,在开展反汪工作中,拿来作为参考资料是十分适当的。”其他文章还有孟晋的《如何根绝和平谣言》(第二卷第九期)、宋绿伊的《讨汪与肃奸的新阶段》(第二卷第一期)等。这些文章被各地抗日团体改编为宣传手册,形成“二次传播”效应。通过《新华南》的宣传,人们对汪伪政权的真正面目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于《新华南》的反汪反投降的宣传工作,中共广东省委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新华南》出版之反汪特辑与欧战问题的临时增刊都是特别为群众欢迎,而实际起了领导作用的。”

二是揭露日寇的阴谋和日寇在华南的罪行。《新华南》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不断组织有关文章,对日寇的新阴谋和罪行进行详细分析和揭露,让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先后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有蔡南圃的《敌人的新企图与我们的新任务》(创刊号),率先对日寇的战略企图进行分析,提醒民众警惕日寇的侵略阴谋。龙伟焘的《暴敌蹂躏下的顺德》(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以顺德沦陷后的悲惨景象为背景,详细描述了日寇在当地的残酷行径,如肆意践踏百姓生活、强迫人民领取“良民证”、大肆倾销鸦片、导致粮食短缺等,展现了日寇的残暴与野蛮,让民众对日寇的罪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吴启燕的《受辱的庵埠》(第二卷第

六期)则聚焦于庵埠地区,揭露了日寇在当地实行的毒化政策,如开设鸦片专卖处、赌场、妓院,强迫民众使用伪币等,深刻揭示了日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压迫。这些文章则以血泪的事实对日寇犯下的暴行予以严厉控诉。

二、昭示敌败:解读国际形势,激励民众抗战

《新华南》将中国国内的抗战作为宣传和报道的重点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发展,发表了不少关于国际述评方面的文章。如石辟澜的《德波战争之前及其预兆》(第一卷第七期)、《欧战前途与中国抗战》(第一卷第八期)、《波兰溃败后的北欧·近东和远东》(第一卷第九期),思慕的《美日在远东的角逐》(第三卷第一期),将中国抗战置于全球反法西斯格局中。例如,《一九四一年世界的展望》(第三卷第四期社论)社论预言“苏联参战将扭转战局”,与半年后的苏德战争爆发形成历史呼应。这些分析增强了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李筱峰的《欧战的新局势与远东问题》(第二卷第一期)、《论巴尔干战局》(第三卷第二、三期),谭天度的《越南问题的演进》(第三卷第二、三期),浩森的《关于日寇侵占安南诸问题》(第三卷第九期)、《论远东新形势》(第三卷第一期),蔡力行的《论苏日关系的发展》(第二卷第八期),黄吉的《关于欧战中的苏联》(第一卷第八期),罗汝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久性跳跃性与闪击战争》(第二卷第十一期)等。这些文章集中地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及其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密切关系,让广大读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有更深入的了解,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

三、共赴国难:团结各方力量,坚持抗战到底

《新战线》:全面抗战初期华南地区团结抗战的旗帜

赵芳 王慧

《新战线》周刊创刊于1937年12月,停刊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该刊由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第三党联合发起、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面成立的广东抗战教育实践社主编,是一份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战宣传刊物。其编委主要由国共两党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评论撰稿人姜君辰、朱伯康、尚仲衣、叶兆南皆为共产党员或左翼人士。《新战线》先后出版民众动员、战时教育、乡村服务总动员及统一战线理论等专号,着力于在报道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现团结持久抗战。该刊主张坚持统一新战线、实行全民总动员,并积极倡导战时教育改革等。

坚持统一新战线
何谓“新战线”?该刊第三期《怎样巩固民族统一新战线?》一文中明白指其为“民族统一新战线”,并强调“各党各派各阶层的统一新战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巩固和加强这一“新战线”是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障。该刊声称自己致力于“做成一条新的联合战线”,“除了国家之外,没有一党一派的立场;除了民族利益外,更没有个人底私见”。此外,在第八期对统一战线理论专号的说明中,记者表示,为尽快实现“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任何政党、阶层、个人均可在“抗战第一”的最高原则下发表意见,并直接以刊物名称“新战线”来回应该刊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呼吁全体国民“站在同一的新的战线上”携手行动,以“撷取中华民族永远的生存与自由”,即为《新战线》周刊创立之初衷。

为向民众阐明民族统一新战线的意义及其践行路径,《新战线》将第八、九期设为统一战线理论专号,发表了《在三民主义大旗下团结起来》《以血肉赤诚拥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发扬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精神》《如何才能强化统一战线》《论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与中国》《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以争取抗战胜利》等文章。《新战线》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贯彻抗战到底的唯一原动力”,也是“建立新中国的唯一基础”,并直言“中华民族如能走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那就是生,中华民族如不能走到全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那就是死”。在阐明统一战线重要性基础上,《新战线》提出,中华民族儿女皆应在“坦白无私和精诚团结”的最高原则下,“不问过去,不问派别”,捐弃前嫌,“以血肉赤诚来拥护这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同时强调,“统一团结”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更应体现在行动上工作上,要在制定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争取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叶兆南等共产党员借该刊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要求加强各党派合作并团结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的主张;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之一”,是争取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实行全民总动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引发各界的深刻反思,《新战线》认为,军事上的失利证明了“政治动员得不够”,政治动员跟不上军事的发展;明确指出,只有全国团结一致总动员并形成“铁的巩固力量”,才能和倭寇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全国民众总动员已然成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

《新战线》强调,要动员民众开展大规模游击战来辅助阵地战,以削弱敌人武器的威力,并将其视为“我国对日抗战的关键”及“抗战防御战争握有最终胜利把握之基本理由”;要动员民众自觉地“把汉奸间谍看成自己的敌人”,自动检查、监视汉奸并与军警合作,使汉奸间谍无法立足;还要发动农民深切了解春耕的重要意义,并认识“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不可分离”……为开展民众动员,《新战线》第一、二期出版了民众动员专号,还先后发表《全面抗战与后方宣传》《持久抗战与全国总动员》《民众总动员怎样开步走》《欲救中国必须开展民众运动》《智识界的动员》《怎样动员中学教员》《粤剧界的同志们动员起来!》等文章,强调实行全国民众总动员已刻不容缓,并对民众动员的具体方式方法进行阐述。

在全民总动员工作中,《新战线》认为,抗战空气不能“只在城市高涨”,组织训练民众工作不能“只限于城市”;反复强调“深入乡村”去动员广大农民已成为“目前救亡工作的一个中心命题”。为此,《新战线》发表了《立即动员乡村里的枪支》《下乡工作如何开步走》《怎样组织农民》《文化人与回乡工作》《建立乡村的统一阵线》《发动乡村文艺通讯运动》《论乡村文化服务运动》《怎样改善乡村政治机构?》《关于广东乡村的服务工作》等大量文章,并将第五、六期设为乡村工作专号,来助力“全民族占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动员工作。该刊极力倡导文化界人士及革命青年在“统一抗日”的原则下,积极地有计划地去教育、组织与武装农民,并通过演讲、表演、照片、图表等通俗的方式帮助农民明了抗战的意义。同时该刊认为,政府必须改善民生以切实解除民众特别是劳苦民众的痛苦,只有使他们“先觉得自己有生的意义”,然后才能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进而动员他们自觉投身到“共同争取民族的生存”的抗战洪流之中。

倡导战时教育改革

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之下,在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生死存亡的搏斗”之中,中国教育究竟该往哪里走?是维持原状还是根据战事变化进行变革?这是当时社会各界极为关注并存有争议的问题。对此,《新战线》明确指出,教育是“广大人群的智力与情感的动员”,是“社会斗争的武器”;教育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着重无法逃却的责任,绝不能“以文化修养为借口,而却去其国防的职责”。该刊认为教育应主动迎合“民族对于教育的需求”,及时进行战时教育改革。

战时教育改革

《新战线》指出,在全民抗战的新时代,教育理应发动战时文化运动,使“每一角落里都感受到救亡的呼声”,使每个人都明了“抗战的意义”与“复兴民族的任务”,并给予青年战士们以“前进的指导,与活跃的机会”。为实现这一目标,《新战线》积极开展战时教育改革的探索。一是提出要改革现有的教育系统。该刊认为,现有教育系统必须要在内部发动“战时教育的更生运动”以健全战时教育之发展,在课程上“尽一切可能接近抗战的需要”,在行动上则“积极辅助学生的抗敌组织及工作”。二是提出“教育战时化”主张,即学校暂停上课,让学生暂时离开学校转而从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实践救亡工作;同时教育工作者亦应在“民族利益民族生存出发”,积极参与与民众的唤醒与解放工作。《中国教育往哪里走》《学生停课大众上课》《民众总动员怎样开步走?》《关于战时教育问题》等文章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三是积极开展战时教育新尝试。《新战线》的主办单位广东抗战教育实践社一直致力于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着力培养从事组织及训练农民的战时乡村工作人员,并试图以教育的方式启发劳苦民众自动自发地奋起实干。《新战线》发表多篇文章总结该社所进行的“华南抗战教育尝试”,系统地介绍了该社自修班、新启蒙班及特种训练班的组织和训练情况,并试图加以推广。值得一提的是,《新战线》第十六期还发表了《陕北青训班的生涯》一文,介绍了陕北青训班学员在当地忙碌而充实的学习情况,增强了华南地区青年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认知。

《新战线》是全民抗战爆发后中共广东党组织以文化界为突破口,积极推进上层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重大成果。透过《新战线》周刊,我们得以窥见在曾为革命策源地的华南地区,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开明人士团结在“拼全民族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团体阶层的利益”等口号周围,力图“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北伐时期民众运动的精诚团结”,努力实现各党派间毫无间隙的精神团结,维护与促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团结持久抗战。今日读之,亦能感受当日先辈们抗战之坚定与赤诚。在全面抗战初期,该刊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从实践出发,于细处着手,对动员华南地区民众特别是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影响极大,被誉为“广州沦陷前最著名的一份刊物”。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抗战纪念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GD23XDS0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重点马院专项课题《全面抗战时期湖南红色报刊与中国共产党党政形象塑造研究》(项目编号:23YBYM37)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工学院;南华大学)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的三维透视

李海媚

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复杂的政治生态,为了促进人民大众的民族觉醒、阶级觉悟,动员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套多层次、系统化、高效化的理论传播实践路径,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建构、立体化的传播网络和精准化、通俗化的传播策略,构建起兼具革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话语体系,实现对广大军民的抗日政治动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从书斋走向实践的理论转化。

(一)内容重塑:开展系统化、民族化的理论建构工程

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面对抗战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开展系统化、民族化的理论建构工程。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系统化、规范化的形态进入革命根据地的话语空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纳入全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整体布局,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工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汇聚了一批兼具理论素养与翻译能力的学者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4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翻译校阅委员会。该委员会翻译和校阅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随着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阐释,使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民族解放任务相结合。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通俗语言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清晰论证了抗战的三个阶段,为抗战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构建更是将阶级话语暂时融入民族话语,为全民族抗战构筑起最大限度的同盟军。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明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动力等问题,也揭示了革命的步骤、方针策略和前途,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在理论建构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通过理论的系统化建构,从根本上解决了“传播什么”的问题。

(二)基石建构:构筑立体化的理论传播网络

为实现高质量的理论传播,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元路径构筑起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化理论传播网络,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化为具有广泛动员力的大众话语。

覆盖全域的宣传体系是理论传播的骨骼组织。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的抗战宣传动员存在“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等问题。为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文本转化为可操作的革命实践纲领,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传媒的力量,打造了覆盖不同区域的媒体矩阵。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以《解放日报》的改版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的建立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构建起报社、通讯社、广播三位一体的宣传体系,发展出版、诗歌、戏剧、标语、口号、教材等形式多样的媒介载体,开展了多形式的理论传播模式,从而使理论传播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模式。如在异常艰苦的敌后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边区领导组建各类剧团和文艺表演队深入群众中开展抗战宣传动员。同时又通过培植群众中的文艺爱好者,使他们成为抗日文化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诗歌、戏剧、舞蹈等的熏陶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抗战革命思想,并转化为支持抗战的实际力量。

组织化网络是使分散的党员、群众能够共享党的思想理论的重要驱动力。为了使理论传播突破地域、阶层和职业的限制,使不同阶层人士能够参与到

月15日龙伟焘的《暴敌蹂躏下的顺德》以顺德沦陷后的悲惨景象为背景,详细描述了日寇在当地的残酷行径,如肆意践踏百姓生活、强迫人民领取“良民证”、大肆倾销鸦片、导致粮食短缺等,展现了日寇的残暴与野蛮,让民众对日寇的罪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第二卷第六期1940年6月1日吴启燕的《受辱的庵埠》则聚焦于庵埠地区,揭露了日寇在当地实行的毒化政策,如开设鸦片专卖处、赌场、妓院,强迫民众使用伪币等,深刻揭示了日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压迫。

结语

《新华南》在华南抗战战场上,既直接服务于抗战动员,又潜移默化地重构了中共在华南的政治权威。其贡献不仅在于战时舆论引导,更在于为中共在国统区开辟了“合法与非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实践路径,成为抗战中后期中共在华南扩大影响力的关键支点。作为中共在华南抗战中的舆论阵地,《新华南》的历史意义远超一般地方刊物。它既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库,也是民心向背的晴雨表。通过灵活运用统战策略、深耕本土话语、创新传播形态,《新华南》成功塑造了“坚持抗战、民主进步”的舆论生态,为中共在华南的政治合法性奠定基础。其经验启示在于: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舆论阵地的建设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团结。今日回望,《新华南》不仅是抗战史的一页注脚,更是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智慧的经典范例。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舆论与政治:全面抗战时期《新华南》的民众动员研究》”(GD23CDS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嬗变研究(项目编号:2021rc005)。

党的理论学习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及遍布各根据地的抗日救国会、农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成为理论传播的毛细血管。此外,为了广泛组织群众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了读报组、黑板报、漫画组、剧社、广播组等宣传组织,借助形式多样的宣传组织提升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筑起“读报组—通讯社—识字组—夜校—学习班”的组织传播架构,成为党的宣传体系的制度化实践,实现了理论对基层社会无所不至的渗透。以读报组为例,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读报组开展读报运动,读报员将报纸上的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传递给人民群众,实现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和价值引领,从而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转化为一系列革命运动和生产建设。

(三)受众区分:实施精准化、通俗化的传播策略

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因此,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掌握群众的理论教育。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中央是理论传播的中枢,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一次全党范围的理论传播和思想统一的实践,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思想达到空前统一,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面对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着重进行利益关联与情感动员,如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有效调动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国共产党着重通过民族大义和民主革命的理想感召来号召知识群体投身革命。对各党派中间势力则通过传播“团结、民主、抗战”的理念以实现价值的共鸣,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知差异,中国共产党采取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本土化传播策略。为使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人民群众所认识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通俗化的理论传播策略。一是宣传语言的通俗化,如为使工农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理论概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农民翻身”、“保家卫国”等口语表达,将阶级理论具象化为“打土豪分田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语境实现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理论传播的生命力。二是宣传形式的通俗化,为了规避理论传播陷入说教式的传播范式,中国共产党通过创作街头化的诗、歌、戏剧和漫画,制作生动的标语和口号,编制革命化的书本教材等,使人民群众通过说唱、动作和视觉实现思想觉悟的提升。

全民族抗战时期的理论传播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成功实践,通过理论的系统性建构、实践性转化与社会性动员的传播逻辑塑造了政党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的新型传播关系,其传播实践昭示:理论传播需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以解决时代任务为导向;理论传播需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对话中凝聚共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中不断散发蓬勃的生命力。

本文系202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号召力的历史经验研究”(GD23XDS04)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